

文化行者

主编：袁兆昌 严飞

# 流动风景

香港文化的时代记认

洛枫 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
浙江大学出版社

文化行者

主编：袁兆昌 严飞

# 流动风景

香港文化的时代记认

洛枫 著

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
浙江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动风景：香港文化的时代记认/洛枫著. —杭州：  
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1. 11  
ISBN 978 - 7 - 308 - 09269 - 2

I. ①流… II. ①洛… III. ①文学评论 - 香港 - 文集  
IV. ①I206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3148 号  
本书经文化工房授权，同意经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  
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。

**流动风景：香港文化的时代记认**  
洛 枫 著

---

责任编辑 赵 琼  
文字编辑 刘 逸  
装帧设计 王小阳  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 
(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  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  
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 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  
印 张 5.5  
字 数 136 千  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 - 7 - 308 - 09269 - 2  
定 价 2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(0571) 88925591

## 简体版自序 手书的风景线

洛 枫

Once I produce, once I write, it is the Text itself which (fortunately) dispossesses me of my narrative continuity.

——Roland Barthes

这是法国文论家罗兰·巴特 (Roland Barthes) 在非常诗化的个人传记《罗兰·巴特》中的片语。说是诗化，因为内里的叙述抒情、充满巧喻和比兴；说是片语，因为作者的文字十分断裂和不依常规，就这样建构了他的童年记忆、学习与写作生活，以及对生命和艺术的哲思。他将自己也看成一个文本 (Text)，通过“阅读”和“书写”作自我审视，文本织成的网穿梭过去与目前，网罗想望与将来，勾成作者奇异的身影——一直以来常常沉迷于罗兰·巴特的书写世界，不但让我增长见识、磨练思维，同时也提升空想的层次、玩味语言表达在不可能之中的可能，他的论述风华照见我一路走来的写作历程，点点滴滴皆有回光返照，我愿在这里追本溯源，为这本《流动风景：香港文化的时代记认》重头细认书写的来龙去脉。

本书来自 2008 年的《请勿超越黄线：香港文学的时代记认》，由香港文化工房的袁兆昌出版，收录我从 1989 年到 2002 年间有关香港文学的评论文字——我属于“板荡的世代”，和我的父母不同，没有经历走难、移居和暴动的日子，却在成长的青葱岁月里碰遇不同的“界线”：刚上大学的时候，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署《中英联合声明》，每日翻开

报章满眼尽是“大限”和“终结”，在美国博士学位还未完成便赶回来看“九七回归”，却只看见了烟花、华服、彩灯和暴雨……板荡的世代，生活于历史的“翘翘板”上，两头不是岸，中间也没有可以立足的支点，只可以继续偏离、刁拧和绕圈。因此，这本文集书写的香港文学论述，冲撞无数的时代界线，并从文化身份、本土意识、解殖民化、家国之恩、香港地区与中国内地的关系、历史再现，以致日常生活的政治、个体抒情的声音、性别与情色、城市与自然等议题，盛载沿路风景的变迁。论述的作家和作品横跨不同的年代，却有着对香港社会、政治、文化、民生、经济共同的关怀，他/她们或以诗歌辨认自我，追思家国，或借用小说虚幻的场景建构现世的理想蓝图，或通过别人的故事演说城市的盛衰起跌，或跨越文化、地域的疆界，寻认香港的历史面貌——第一部分通过“文化阅读”的方法，透视香港文学寄存的生态环境，或因应社会事件而作出的时代回应。第二部分从作家个体生命的经验出发，勾勒众多不同的呼唤声音，如追寻自然的呐喊、抒发自我的家国之恩，甚至是咏物的静观、爱情的省思，看诗的咏唱如何拍动城市时刻跃动的心跳。第三部分采用短小的篇幅、轻松的笔调，评述香港文学一直流动的点线面，从牵涉两岸三地政治的小说，到缱绻个人情色想像的诗歌，从女性静默的叙述，到男性变身的性别建构，共同编织纵横交错的年代喧哗——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，因为在世界辽阔的版图上，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这样经历如此不完整的殖民与解殖民经验，以及异常的城市发展；这些经验不因年月的流逝而变旧，亦不因空间的改换而消亡。

开首提及罗兰·巴特的话语，说当我在书写的时候，“文本”即夺取了叙述的延续性！那是一种自我融入的书写状态，文字刹那活起了自

己的生命，主宰叙述、描绘、论辩的流向，带点身不由己，同时又物我两忘，这正是我用笔书写香港的情状呢！是的，是用笔书写，我不懂中文电脑打字，向来都是手书原稿，这“手书”的情境犹如巴特所言那样，即使是理论的建构，也让“自我”涉入甚深，由眼观、手动，然后意随心发，便完成了香港这座城市的七色图像，时而青春律动满溢朝气，时而暮霭沉沉仿佛风烛残年。香港的故事、心事，连着历史的血肉、时间的沧海桑田、空间的崛起又倒下，辗转留下斑驳的痕迹，而我的“手书”既有个人文化背景的视点所在，也有主体情愫的牵缠，总希望视点不是盲点，纵然只从一山一水量度海岸的变迁，只从一诗一文浮照街头的灯火，甚至只凭一些市声的交迭勾勒日常生活的剪影，但仍希望能用鲜活的文字网住香港稍纵即逝的流动风景。

2011年10月1日 香港

## | 社会政治的回响

- 从“解殖民化”到“本土意识”的探索——论 20 世纪 70 年代  
香港专栏文化的历史及社会脉络 3
- 历史想像与文化身份的建构——论西西的《飞毡》与  
董启章的《地图集》 24
- 苍凉与温暖——论李国威的抒情自我与家国之思 46

## | 个体生命的呼唤

- 你仍会驻足而歌吗？——论吴煦斌追寻自然的声音 65
- 浑圆的实体有自己的重量——论王良和的“咏物哲理诗” 79
- 谈谈情、说说诗——论香港情诗的风貌 99

## | 年代的喧闹

- 破瓮观树——读叶辉的散文集 115
- 诗说香港——读《舒巷城卷》 121
- 实验语言叙述的可能——读《香港文学小说选》 127
- 明信片的爱情与政治——读也斯小说 134
- 语言的静默——谈吴煦斌的小说 137
- 咏物的散文——读吴煦斌的《看牛集》 142
- 关于“物”的故事——阅读三个魔幻的文本 146
- 边界、媒界、文类的跨越——谈“文化视野丛书” 150
- 阅读角度与作品意义——读董启章的《安卓珍妮》与《双身》 155

性别与文化的本位意识——谈游静的《裙拉裤甩》	161
城市·小说·世俗生活——读董启章的《V 城繁胜录》 与《The Catalog》	164
情色地图——读昆南的《恋石别曲》与《绝凶之艳》	167



## | 社会政治的回响



## 从“解殖民化”到“本土意识”的探索

——论 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专栏文化的历史及社会脉络

### 前言：从“专栏小说”与“书写香港”谈起

1975 年，西西的小说《我城》在当时香港由刘以鬯主编的《快报》副刊上连载，每天一千字，字间镶嵌一幅画和几个字，平行拼贴，从 1 月 30 日至 6 月 30 日，连载略近半年，数数是一百五十天。<sup>①</sup>1977 年，也斯的中篇小说《剪纸》同样也在《快报》上连载，从 4 月到 5 月，几近两个月。<sup>②</sup>香港重要的小说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，除了《我城》与《剪纸》外，刘以鬯的长篇力作《酒徒》于 1962 年连载于《星岛晚报》上<sup>③</sup>，而西西后来的《美丽大厦》也是于 1977 年间刊于《快报》的副刊专栏上<sup>④</sup>，此外，刘以鬯大部分的中篇小说都是连载于不同报纸的副刊上，像 1960 年连载于《成报》的《亚财与细女》、1969 年连载于《明报晚报》的《镜子里的镜子》<sup>⑤</sup>。由此可见，香港报纸的副刊专栏，乃孕育香港文学及培养香港优秀作家的重要园地。<sup>⑥</sup>

① 西西：《序》，《我城》，台北：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，1989，第 1 页。

② 叶辉：《序》，也斯：《三鱼集》，香港：田园书屋，1988，第 5 页。

③ 刘以鬯：（写在《酒徒》重印之前），《酒徒》，香港：金石图书公司，1993，第 1 页。

④ 西西：《后记》，《美丽大厦》，台北：洪范书店，1990，第 211 页。

⑤ 刘以鬯：《自序》，《刘以鬯中篇小说选》，香港：香港作家出版社，1995，第 2 页。

⑥ 由于论题所限，这里无法详细讨论香港小说与报刊专栏的关系，有关资料，可以参阅刘以鬯：《序》，载于他编选的《五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说选》，香港：天地图书公司，1997，第 1—7 页。此文详述 20 世纪 50 年代香港小说如何在不同的副刊发展和成形；另外，也可参照张焕聘、黄子程：《访问刘以鬯先生》，香港：《博益月刊》，1988 年 5 月第 9 期，第 162—168 页。访问中，刘以鬯以长期担任报刊编辑的身份，讨论 70 年代报纸专栏与孕育香港作家的关系。与此论题相关的资料，仍有待发现、补充和整理。

西西的《我城》与也斯的《剪纸》，最初是以报纸副刊的专栏形式每日连载，书写香港 20 世纪 70 年代的面貌，前者以童话的寓言格局，涵盖整个香港社会发展的重要脉络，或正面批评香港的清洁运动、教育问题、语言及文化身份的疑虑，或侧面映现中东石油危机与越南难民问题对香港生活及经济的影响；后者透过魔幻写实的手法，配合精神分裂的书写，呈示 70 年代末期的香港在踏入 80 年代的时候所面对的困境，当中包括资讯社会的发达及其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异化、商业文化潮流带来的生活幻象，以及城市高度的发展对香港地貌与精神文明的破毁，等等。换句话说，《我城》和《剪纸》的连载，是以报纸的专栏形式，逐日逐日的书写和建构 70 年代的香港，是与每日发生的社会大事及副刊上其他形形色色的专栏文字，一起出现或互相对照的，这是香港专栏文学的特色。从《我城》与《剪纸》书写香港的连载特性，联系香港专栏文学的文化色彩，确实是一个有趣而又亟待探讨的话题，譬如说香港报纸副刊专栏的历史发展到底如何？专栏的文学性与文化意义又在哪里？作为一种媒体，专栏如何发挥它的社会功用与文化反思的能力？寄存于新闻报纸之中，副刊的空间又如何与社会现实息息和应或参差比对？这个篇章，没有企图在狭小的范围内解决上述庞大的提问架构，却只尝试通过对 70 年代两份报纸——《香港时报》及《快报》——不完整的阅读<sup>①</sup>，整理当时副刊专栏的文化面貌，以及处身其中的历史背景、社会脉络和世界局势，当中涉及的议题包括：自 1967 年暴动以来的“解殖民化”过程（the process of decolonization）背后隐含的殖民体制，70 年代香

港“本土意义”(local consciousness)在不同文化范畴上的成长与蜕变,香港社会结构与经济模式的转型对大众生活的牵动,中国内地及世界局势的变化对香港的影响,同时,也探讨在以上种种的冲击下,报刊专栏与日常生活的关系,以此作为探讨香港70年代文化面貌及风采的一个切入点。

## 1. 政治改革与社会建设

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,是从五六十年代“难民社会”发展至注重本地建设的时代,也是下开80年代社会丰裕的基础。所谓注重本地建设,指的不但是港英政府自1967年“暴动”以后,实施一系列企图安定民生、建设的措施,而且还指向在各种社会运动冲击及各类普及文化迅速发展的带动下,香港文化的本土意识与本土身份的探索与确认的阶段。70年代的香港,有别于五六十年代的难民社会,造成差异的因素众多,除了是人口结构(从内地移民到本地成长的一代)与经济模式(从转口贸易到工业制造到金融业发展)的转变以外,施政的方向、社会运动的诉求以及中国局势的转变等,都是主因,其中尤以1967年的“暴动”最为分水岭及转折点。

不少论者认为“六七暴动”是香港历史重要的转折<sup>①</sup>,转折的迹象,除了是港英政府为粉饰太平、转移公众视线而筹办的“香港节”与“工展会”等活动的表象以外,重要的还是英国政府对香港殖民地政

<sup>①</sup> 相关论点,可见冼玉仪:《社会组织与社会转变》,王赓武主编:《香港史新编》(上册),香港:三联书店,1997,第205—209页。或Thomas W. P. Wong,“Colonial Governance and the Hong Kong Story”,*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-Pacific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No. 77*, HK: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March 1998, 6-18.

策的调整，如何通过表面的解殖化的施政方针与本地化的社会建设，进一步加强治理香港的稳定力量。从1967年到1979年，处理香港事务的港督是戴麟趾（Trench, Sir David Clive Crosbic, 任期：1964—1971）与麦理浩（Maclehose, Sir Cranford Murray, 任期：1971—1982），其中尤以麦理浩的影响性最大。他的建设香港计划固然重要，但他以出身外交部，第一个驻外大使身份调任港督，打破历来港督出身军部将领或资深殖民地官员的惯例，也不容忽视<sup>①</sup>，事实上，麦理浩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中国工作的经验，实在有利于他在70年代的任期内，试图解决香港在1997年后的前途问题。

从1971年到1979年，麦理浩推行一系列建设香港的计划——房屋方面，1972年宣布十年建屋计划，投资80亿元，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公共发展计划；其后，又在1967年推出“居者有其屋”计划，协助中、下人息家庭解决住屋问题。基建方面，1972年海底隧道正式通车，1975年11月开始动工建造地下铁路，第一期工程提前在1979年完成。城市规划方面，从70年代初期的“卫星城市”构思，到70年代末期的“新市镇计划”，标志香港城市与社区面貌的急剧拓展。教育方面，1972年筹建理工学院，1978年实施学童享有“小学六年、中学三年”的“九年免费教育”。社会事务方面，1972年发起“全港清洁运动”，1973年举行“扑灭罪行运动”。文娱康乐方面，1977年举办第一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及落成香港艺术中心。政制事务方面，自1973年开始改革立法局，取消官守议员席位，只保留委任与选举产生的非官守议员，至1981年首次成立区议会，同时，减少行政局白人色彩，把非官守议员本

<sup>①</sup> 有关麦理浩的背景资料及任期，可参考《香港全记录卷二：一九六〇—一九九七年》，陈昕、郭志坤主编，香港：中华书局，1998，第140页。

地化；另外，1974年成立“廉政公署”<sup>①</sup>——从以上的施政及建设看来，70年代是香港政制及社会的建设期，然而，撇开官方的汇报，除却新闻的资料性，从这些基建及施政当中，可牵引三个讨论的重点：第一，实施这些建设背后的社会因由；第二，这些建设带来的社会及文化效应；第三，这些建设计划与英国政府殖民地政策的配合。探讨以上三个重点，不但可理清在“解殖民化”与“本地化”过程背后仍然存在的殖民意识，而且还可揭示在其他社会运动及普及文化发展的撞击下，香港“本土意识”出现的异貌。

香港政府在70年代的政制改革与社会建设，施行的目的和背景，可追溯至“六七暴动”，以及70年代种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。正如郑赤琰指出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代与50年代的全球性非殖民地化的发展，远东的非殖民化到了六七十年代，基本上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，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形势；经历“六七暴动”以后，英国为强化统治，由戴麟趾和麦理浩作出了种种社会福利与港人权益的建制工作，对行政局作出了相当的非殖民化改革<sup>②</sup>。郑氏的观点，可作参考的有二：一是香港70年代的非殖化是在全球性的背景中进行的，这将在下文论述；其次，香港70年代政制的本地化，及政府推行的各类基建，乃因应“六七暴动”而来的政治需要，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英国殖民地统治，防范危害治权的暴乱再起而产生的。除了以上的政治因由外，70年代的政改与建

<sup>①</sup> 以上的政制改革及社会建设资料，除可从《快报》及《香港时报》新闻及时事版取得外，亦可参考《香港全记录》（《香港全记录卷二：一九六〇—一九九七年》，陈昕、郭志坤主编，香港：中华书局，1998），还有下列来源：《香港年报》（*Hong Kong Report*），1970—1979（共10册），香港：香港政府印务局，1971年至1980年出版；郑赤琰：《战后香港政制发展》，《香港史新编》（上册），香港：三联书店，1997。

<sup>②</sup> 郑赤琰：《战后香港政制发展》，第134—139页。

设，也是基于当时社会及经济危机的压力所致。《香港时报》于1970年9月7日一篇题为《一个严重的问题——略论本港的社会风气》的社评指出，自“六七暴动”后，踏入70年代的香港，面对种种复杂的社会问题，治安的恶劣造成社会不宁、人心浮动<sup>①</sup>；1972年2月另一篇社评更具体阐述香港经济放缓的因由及其造成的恶果，论者指出由于世界经济发生调整期的困难，导致香港出口贸易的退缩、工商业经营困难，带来物价与租金高涨，削弱群众的购买力，加上治安日坏，青年暴力犯罪案件直线上升，加重了社会负担<sup>②</sup>。事实上，自1967年出任辅政司、至1973年离任的罗乐氏，在离开香港前也对外宣称，当时的香港急切需要解决三大问题，即居住问题、中学教育问题及贪污问题，其中贪污问题尤使港府感到困扰<sup>③</sup>。综合以上评述，大致可勾勒70年代香港政改与建设的社会背景，那是一个隐伏各项民生困扰的时艰：自60年代开始，受内地政治风潮的影响，大量内地民众涌入，人口急剧增长<sup>④</sup>，造成住屋、就业、教育及治安等各项社会问题；其次，1973年的股票狂泻，亦严重打击香港经济，市面上一片萧条景象，工厂倒闭，失业率急升，直接导致治安恶劣、通货膨胀的压力；加以自70年代中期开始困扰香港的越南难民问题，社会更形百上加斤。就在这种种社会迫切的需求下，殖民地政府为安抚人心、稳定统治力量，推行一系列对应的措施，例如以“十年房屋计划”解决因人口激增的屋住问题，兴建隧道、铁路舒缓混乱

① 社评：《一个严重的问题——略论本港的社会风气》。香港：《香港时报》，1970年9月7日。

② 社评：《春节论香港社会前途》。香港：《香港时报》，1972年2月14日。

③ 有关报道，详见香港：《香港时报》，1973年10月1日。

④ 有关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人增长的数据，及劳动力分布的情况，可参考香港政府年报人口普查的结果及分析，载于《1976年香港年报》，香港：香港政府印务局，1977，第1—9页。



的交通情况，成立廉政公署惩办贪污事件，举办“扑灭罪行运动”，提高灭罪意识，扩充中、小学以解决移民孩童的教育需求。推行这些针对性的措施，一方面固然莫立了香港的社会体制、经济基础、通信及运输系统，为香港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做好准备，但有时候，当有关的措施未能即时达到预期的效果，不但加深了原有的危机，同时亦会产生相应的问题，例如大量的社会建设，造成城市破毁、交通混乱、历史古迹文物无法保存及环境污染等问题，尤其早期“新市镇”的兴建，由于部分计划失误，更导致社区混乱的情况。

从以上的论述看来，港英政府在70年代香港推行的“英式民主政策”<sup>①</sup>，是在解殖化的趋势下殖民地政策的一项调整——诚然，“六七暴动”除了受内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牵引以外，也源于普罗大众对殖民政府的不满，而港英政府的亲民及解殖化政策，例如于1968年首度开放港督府给市民赏花，或其后为洗除殖民统治色彩，不断更改政府机构及官员的称号、加强华人参与政府事务的机会等，目的无非是进一步确立英国政府在香港的治权，而从70年代短短十年间英国皇室成员三次访问香港看来——包括1971年的安妮公主、1975年的英女皇伊利沙白二世夫妇、1979年的查理斯王子——更可看成是英国政府在亲民的旗帜下对自身殖民权力的体现。然而，尽管70年代香港政府的解殖化与本土政策，包括强烈的殖民意念，但强调本地色彩的政治体制及社会建设，在社会运动的冲击及普及文化的推展下，的确带动了一股较诸前期更为强烈的本土意识，此外，审视中国政府在80年代之前一直对香港九七年后前途问题的关注及表态，以及中英双方关系的演变，便更能发现70年代的所谓“解殖民化”与“本土化”，包含极大的政治因由。

<sup>①</sup> 郑赤琰：《战后香港政制发展》，第142页。